

贵族的理想

——他们支撑了中国

张华侨 著

作者经过十年调查，揭示了一个真相：历代帝王阻止亿万
人改变苦难的命运，而贵族以理想向社会输送经济与文化资
源、构建公平正义、维护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因而贵族的品
质，有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品质与公民的理想！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贵族的理想

——他们支撑了中国

张华侨 著

華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贵族的理想：他们支撑了中国 / 张华侨著. --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6. 4
ISBN 978-7-5075-4502-9

I. ①贵… II. ①张… III. ①家族-研究-中国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8117 号

作 者：张华侨

责任编辑：雷平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songjunzhan@sina.com

电 话：编辑部 010-58336225 发行 010-58336267

邮购 010-58336253

印 刷：天津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4

字 数：378 千

版 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贵族的品质为何决定国家的品质

刘毓庆

2015年12月16日,《中华读书报》刊出了我撰写的《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一文,没想到短短的数天,在微信上点击就超过六万,而且还有47家微信平台转发。同时接到了认识与不认识朋友的电话十几个,其中就有张华侨先生。

张华侨先生觉得,我对乡绅的认识与他不谋而合,又说他用了10年时间,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调查明清时期贵族及其家族经济的兴起,发现这是一支推动和稳定中国社会的巨大力量。为此他撰写了一本书《贵族的理想——他们支撑了中国》,希望我能为他的书写篇序言。

我觉得自己不是研究乡绅,只是因为出身农村,对农村有感情,看到了当下农村凋敝现状,有感而发而已,写序言实不敢当。后来张先生把他的部分稿子给我发来,恳切地要求我能写几句话。当时我只是回答说,等看了稿子再说。

当我看了他的提纲和部分稿子后,心动了,震撼了!尽管作者的观点与我不完全相同,但他的那种眼光、胆略和气概,我不得不佩服。因为他研究的是一个被中国人长期误解甚至批判的群体。在半个多世纪的阶级论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一提到乡绅,在观念中马上就会置换为“土豪劣绅”;一提到贵族,就会想到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阶级本质。因而会很自然地把这个群体与罪恶联系在一起。

但作者对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的名门望族调查后,旗帜鲜明地提出:“贵族的重大贡献是:以家族经济共同体配置经济与文化资源、帮助平民消除愚昧无知、推动中国向富民强国转变!”“贵族的品质决定国家的品质,一个有贵族奉献

精神支撑的国家,有利于国民树立理想的高度、改变道德信仰危机、实现光荣与梦想!”

这种声音,在曾经受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风波的人听到会吓破胆。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与政治变革,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谈论这种问题,仍有不同的认知观。

可贵的是,作者走访了在文化、经济、政治领域具有贡献的家族,通过大量第一手材料,论证了这一问题,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以秀才、举人、商人、地主、官员、学者等组成的“贵族”,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免疫功能,对于维护中国稳定和正常秩序起到了政府无法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个群体在国家权力无能为力的地方,承担起了保护一方平安和发展、建设的责任。

他们立足乡土,比任何封建时代的帝王将相更关心家乡的建设与老百姓的生存。他们是深深植根于乡间土壤的大树,乡间的阳光、雨露、水分、肥料、土壤、空气滋养了他们,而他们又用绿叶长枝营造一方文化生态。像地方教育、医疗、治安、交通、救济等公共资源,大都出自他们之手。作为国家法律补充的地方规约,也由他们组织制订。

他们在乡村、集镇、县城等承担了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不仅引领和指导乡村社会的发展,而且还为国家培养输送人才。在传统中国社会支撑政府大厦的成千上万的进士、举人,并不是由国家培养,而是这些富家大族,即作者所说的“贵族”。这是一个长期被埋没的事实,而今作者向世人揭开了这一真相。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这个群体靠家庭积累的财富和自己的智慧成就了家业和事业,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承担了政府不能承担或无力承担拯民济世的责任呢?我想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以道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而作者看到了这个核心要素,并在书中以极为详细、生动、感人的事实,呈现了这个群体如何以道义支撑了乡土中国的运转!

我认为,这种观念传自上古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理论完善于孔子。是孔子编定的“五经”经典体系承载了这种观念,并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核心。大批乡绅——即张华侨先生所称的“贵族”,便是这一文化思想与精神的传承人。他们用这种价值观念、这种文化思想及精神滋养自己,成就了自己,又变为有效的行动,犹如布云施雨,润及一方,随后又影响下一代,就这样代代相传。

这种价值观念呼唤他们自觉地承担社会道义,他们对社会道义的担当,并不像西方一些慈善家仅仅办慈善事业而已,而是同时发挥政治功能,参与地方管理。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一部分有为官的阅历,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协调社会的各种矛盾。他们的德望为一方表率,他们的德业为一方依赖。

所以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说:“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动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假如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这样一批道义担当者,没有作为乡村灵魂的乡绅存在,乡村不仅会成为文化沙漠,还会成为地痞、无赖的世界。

也就是说,是传统以道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支撑了乡绅的精神,他们又以这种理想支撑了传统的乡村社会。至于“劣绅”,那是在末世社会整体腐烂、政治空气污染中出现的“疫情”,并不是常态,不能因民国时期生产了一批劣绅,就全面否定乡绅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积极作用。

从张华侨先生这部大著可以看到,他回望那个远去的时代,以事实为依据,特别彰显了“贵族”为民谋利、忠诚爱国的道义精神,显然是在道德沦丧的背景下流露出的“忧患意识”。

近三十年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中国乡村普遍出现了“贫血症”。一方面政府推进城镇化进程,另一方又提倡新农村建设。如何让城乡协调发展,成为当下一道难题。城镇化是依照西方国家的模式设计出的方案,目的是加快经济发展。

然而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却出现了无计划、无秩序状态。大大小小的城镇,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被闲置楼和烂尾楼包围的现象。据有关专家评估,批准要建、正在建和已经建成而没有出售的房产,加起来够四亿人住,这是多大的一笔浪费数字!

因为这个原因,政府不得不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消除库存。与此相对应,广大农村却出现了老弱留守、青壮外流、校舍凋敝、田园荒芜的现象。中国传统文明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根在农村,农村的衰落,必然导致传统文明承传的危

机。因而政府不得不提出新农村建设的问题,而且投入了大量资金。

也就是说,政府推进城镇化,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提倡新农村建设,又是出于文化的考虑。而新农村建设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奇缺,乡绅消失,农村没有传统文明的继承人。笔者在《乡绅消失后的农村命运》一文中曾提到:原本应属“乡绅”群体可以引领乡村社会的人群,统统变成了城市人。先是城市工作的离休老干部,他们安居于为功臣建起的休干院、疗养院而乐不“思蜀”。

其次是工职人员中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第一代人,因农村失去土地,完全没有“归根”的意愿,安居城市。再其次是基层官员,工作在乡,退居则入城。其他是八十年代以来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大学生,一批毕业于名校,留居城市工作;还有一批毕业于不入流的学校,在三十年前原本应属于初中生是可以留居农村的知识人,现在也有了大学生身份,漂于城市而不思归。

可以说,乡绅群体的消失,让乡村失去了文化领袖和灵魂,没有了指导和提升文化教育的导师,农村开始变成文化沙漠。更令人难堪的是破败的村落,让传统道德丧失、腐烂,给地痞、无赖、赌徒、不肖子,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当道义丧失后,人还有什么事不能做?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从前的乡绅,以道义撑起了乡间的蓝天;而今乡村的蓝天靠什么支撑、靠何人支撑呢?而张华侨先生描写的《贵族的理想》,展现了那个时代贵族的学识、品质、理想,召唤国民认识他们如何以仁义忠孝凝聚道义,支撑了互助友爱的乡土社会!

我们应该认识到,城镇化和商业化,是农业文明的两把断魂剑!城镇化铲除的是农业文明生长、生存的土壤,商业化消灭的是农业文明的传人。当下人们一种很可怕的认识是:认为工业文明(实际上是商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却忽略了工业文明只是历史的一个过程,是插曲,而不是目的,它除了刺激人的财富欲望、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激情外,给人类带来的不是精神上的愉悦和持久的幸福。

相反却让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大,导致人的精神世界走向萎缩,人间的温情与善良被规定在制度的框架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物质间冰冷的结构关系。甚至由于竞争合法化、合理化的理论阐释和利益最大化的无限追求,还为人类埋下了种种危机的种子(如资源枯竭、生态破坏、战争危机)。

特别是为了竞争资源、竞争利益,有些国家把最聪明的大脑用在杀人武器的制造和应对、消灭对手的谋略上。显然这种文明如果没有节制的发展下去,人类只能等待消亡。著名科学家霍金提出的“人类如何才能继续生存一百年”的难题,将永远得不到解答。

我们回头看农业文明,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农业文明创造的不是机器、设备、工具、玩具、小商品等冰冷的东西,而是生命。无论鸡鸭猪狗,还是麻麦菽谷,都是在人的关照中成长、在风调雨顺中发展的生命。由这种生活方式产生的文明,注定了对于生命的关爱。而其对于世界的认识,也认作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联系。

也正是这种文明,创造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价值体系,这个道德体系又体现着天人一体、民胞物与的和谐、包容、仁爱精神。仁义礼智信,“仁”追求的是心性的和谐,“义”追求的是行为与内心的和谐,“礼”追求的是上下、周围关系的和谐,“智”追求的是自我与外物的和谐,“信”追求的是彼此交往的和谐。

唯有和谐,宇宙才能充满生机;唯有仁爱,天地万物才能生长;唯有包容,万物才能并育而不相害。这个价值体系可以保证人类的长治久安,使人类在和平安详、相互包容中发展。

但是目前这个价值体系,却受到了商业化与城镇化的致命冲击。谁来保护并承传承载这个价值体系的中国传统文明?恐怕只有乡绅,只在农村沃土上成长起来、并对农业文明有深刻认识与深厚感情的有识之士。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因为他的好多预言都被历史证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看到西方过度工业化出现的社会问题后,就把人类未来继续生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因为他看到了西方工业化发展潜在的危及人类生存的隐患,看到了与西方“生存竞争”处世理念不同的中国文化的包容、和谐精神,看到了当时中国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农工平衡的发展道路。他认为,过度工业化的道路是自我毁灭的道路。

如果中国能避免急于紧步先进工业国家后尘去实现工业化,在坚持以往“农业模式”基础上发展工业,创造出保持农工平衡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极有可能在先进工业国家陷入“超工业化”的混乱之时,从它们手中夺取世界的主导权,创造出以东亚为“基轴”的名符其实的世界国家(日本山本新、欣村秀二编《未来,属

于中国——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杨栋梁、赵德宇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3 页）。

遗憾的是，中国没有听取汤因比老先生的忠告，却让当下中国出现了汤因比当年看到的西方工业化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混乱状态。然而大多中国人却仍执迷不悟，误以为这是一条追求幸福之路。尽管幸福越来越遥远，可他们却把财富增加误作了幸福。

正如荀子所说：“权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之路，这非常令人担忧。在这种形势下，保护中国文明的根，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保护中国传统文明，就是保护人类继续生存的命脉。谁来保护这个命脉？如何保护这个命脉？能回答这一问题的仍只有乡绅。

因此，张华侨先生的大著《贵族的理想》，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农村社会不能没有乡绅，不能没有道义，需要具有奉献精神的贵族输送能量，引领国民富而好学、富而好礼，提升一个国家的品质与文明素养！

历史发展也在作这样的预示：农业文明是人类的生命线。没有工业，人类照样可以生存；没有农业，人类就只能死亡。人类的前途在于农工的平衡发展。加大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是遏制人类自我毁灭的有效方略。保护人类继续生存的命脉——中国传统文明，期待乡村重建，乡村重建期待乡绅回归！

于太原椿楸园 2016 年 2 月 16 日

作者为山西大学国学院院长



掀起中华民族第一次经济建设浪潮

为什么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灾荒、战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依然维持一个稳定、统一的文明体系?为何明清两代,以秀才、举人、商人、地主、官员、学者等组成的贵族,以输送物质财富、文化与制度资源,支撑了中国?

我不是从王朝的兴衰、宏大的历史事件寻找答案。从2005年至2010年,我不间断地在安徽、江苏、浙江、湖北、江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调查,以徽商、浙商、晋商等富有大家族的兴衰为个案,以贵族构筑的祠堂、牌坊、族谱、家法等体系发挥的作用,揭示他们如何成功实现家族的荣耀,又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真相。

调查发现,明清两代:江西吉安、抚州;湖北黄冈;安徽徽州、宣城;浙江金华、湖州、绍兴;江苏苏州、扬州;山西晋城、长治等地,形成了共享生存资源的家族经济共同体。

虽然他们没有世袭的政治权力,但有延续千年的家族经济共同体,营造一个稳定的生态环境,支撑他们取得的第一个成就是:把自然资源与皇帝掌握的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推动商品流通,掀起了中华民族第一次经济建设浪潮,造就了一批富有的贵族。

文明只有依托物质成果,才能像富有营养的牛奶、面包,造就一个民族健康、强健的躯体。贵族把银子带回家乡,把简陋的泥土房,变成了雕刻精美、华丽的大宅院,把灰色的粗布衣,更换成闪光发亮的绸缎衣,最大化提高家人的生活水平,创造的物质成果超过了现在有些乡村。

以道义向社会输送公共资源

贵族取得的第二个成就是：秉承振兴家乡的责任，又从爱家扩展到爱国的道义，给社会输送教育、医疗、治安、交通、救济等公共资源，让更多人分享他们创造的物质成果。

历代皇帝、王侯、官僚是消费阶层，占有政治与经济资源，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却没有动力为人们提供公共服务，老百姓是否有机会接受教育，能否获得脱贫致富的机会；遇到强盗、土匪袭击，能否保障人身安全，完全取决于贵族是否提供援助。

明清两代，社会结构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家族经济共同体主导经济与文化资源分配，长江中下游的江西、安徽、浙江、江苏的家族，把物质财富转为文化资源，修建大批书院，培养子弟读书成才。

明代，浙江、江西通过进士考试获得官位的人排在前两位；到了清朝，江苏、浙江占据前两位，形成家族拥有的物质财富，决定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地位，经济又带动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决定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文化兴旺！

同时，他们以道义支持文人出版作品、修建图书馆，让知识从达官贵人手里，分流到平民百姓。像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一样，给中国带来了第一次文艺复兴。

所以沿着泰州、扬州、南京、苏州、嘉兴、杭州、绍兴、金华、湖州、宣城、徽州、抚州、吉安，靠官员、富商、学者贵族带来的文化资源，形成了一条“文化走廊”。

为何能维持家族自治与国家运转

明清两代，贵族取得的第三个成就是：依托家族经济共同体占有物质财富与文化资源，有资本向社会输送制度资源，也就是制订乡规民约，与王权互相配合，既维护家族自治、保障成员共享生存资源，又支撑国家运转。

浦江县郑宅镇郑家制订家规：财产属于宗族所有，族人共享住房、食物、教育、治病等资源。发现子弟私自积累钱财，由家长带领大家到祠堂，声讨他隐藏财产的罪行。郑家靠富有生命力的家法，在一起同住生活 300 多年，得到几个朝代皇帝赋予的政治荣誉。

从族人的需求看,他们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分享贵族提供的生存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达成互相合作,应对外部力量的挑战获得安全感,不可能挑战家规,反而要维护宗法。否则,有可能面临生存危机,这是他们遵守家法的重要原因。

从王权的角度看,皇帝的权力只传递到县级,不能给乡村提供法治等公共服务。朱元璋执政时,提倡“治国之道、教化为先”,除了亲自与专家、学者制定法律以外,还出台了大量的红头文件,让乡村有威望的知识分子、地主、商人等贵族,裁决老百姓之间的纠纷。

朱元璋给子孙留下最大的政治遗产是:成功动员乡村的宗族,制定约束族人行为举止的家法,又与王法结合,制造了一台坚固耐用、不需要原料的统治机器,为世界塑造了一个超级专政帝国。

操作这台机器的是贵族,他们以家法输送制度资源,帮助皇帝维持县级社会的自治,化解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弥补皇帝不给乡土社会提供司法资源的弱点,而且遵守家法等于服从王法,忠于宗族可以转化为效忠帝王。这是明朝有些皇帝毫无作为,还能延续 276 年的重要原因!

但也有负面效应:经历大动乱后,国家又回到王权体制,不能由人治转向法治,社会结构依然以家族为主,族权与王权把手紧紧地握到一起,进一步巩固专政体制。

他们如何把仁义忠孝,转化成平等互利的规则

宋代以前,皇帝与神权结合统治天下,把礼制当做维护自己特权的工具,不向老百姓传播。他既不承担国家经济与文化建设的责任,又不构建普遍的信用意识。

明清两代,在皇帝没有普及法治的情况下,贵族对国家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以家族经济共同体,成功地试制出宗谱、祠堂、牌坊等礼制工具,从中提炼出“仁义忠孝”,变成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道德规则,对消除暴力政治,减轻老百姓的生存风险、构建一个诚实守信的文明社会、维护国家稳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仁义忠孝资源的积累与扩散效果看,黄河流域战乱、自然灾害不断,几乎每个村子、集镇、县城建有寺庙,祈求超个人力量的神仙帮助自己化解灾难。居民以神权崇拜为主,缺乏从家族延伸出来的忠孝,建立平等互利的社会规则。

长江流域雨水充足、土地肥沃,适合人们居住、耕种,产出效应比较高,生存风险比黄河流域的居民低,宗族相对稳定,几乎每个村子修有祭拜祖先的祠堂,以祖先崇拜为主。

祖先崇拜比神权崇拜的优势在于,祖先是一个宗族的起源,确定了忠孝治家的准则,更能唤起公民对家族、对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忠诚感,向理性、平等互利、尊重他人权利、承担富民强国的方向前进。所以辛亥革命爆发后,长江流域家族经济共同体培育的贵族,能够放弃官位、财富,打响摧毁王权、建立现代国家的战斗。

徽州歙县棠樾村鲍家、雄村曹家、呈坎罗家等,以经商积累物质财富,以读书做官取得政治地位,不惜消耗白银修建祠堂、牌坊,唤起族人患难与共、共同抗衡生存风险、应对外部力量挑战的意识。

每个宗族的祠堂是一所不需要皇帝支付教学经费的道德学堂,通过庄严、神圣、具有程序的集体祭祖仪式,家族权威、血缘关系、等级意识、忠孝至上等渗透到每个成员的心中,像无形的纽带将他们联结在一起,不容许个人损害宗族与国家的利益,否则,会受到惩罚。

经过家族道德学堂的培训,到朝廷做官的贵族,希望以“仁义忠孝”引导皇帝,从暴力政治向仁义转变,从极端回归理性,避免暴力释放出来的罪恶,摧毁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与文化成果。

到集镇、县城经商的贵族,把家族积累的忠孝资源,转化为诚实守信、取财有道、公平交易、对顾客负责的商业准则;遇到灾荒,又承担捐资救济灾民的责任。

正是贵族把家族经济共同体积累的忠孝资源,变成普遍的信用规则,从治理家族扩展到维护国家秩序,明清两个庞大的帝国,在没有建立专业司法队伍,没有给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况下,统治时间都突破了260年,为世界王权统治史创造了一个奇迹!

然而,在缺乏法治制约的情况下,中国人积累了深厚的仁、义、礼、智、信资源,没有转化成监督、罢免皇帝、官员的权力,皇帝随时会突破礼制的底线,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他不信任的人。暴力政治贯穿每一个王朝,像滔滔不绝的洪水,给亿万人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贵族与王权博弈获取千万资产,却没有法治保障

一个民族的文明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停滞不前还是创造伟大的奇迹,要看政治家与资本家能否优化配置政治与经济资源,从糊口的小农经济转向工业文明,能否与王权决裂,迎来民主、法治!

明清两代,徽商、浙商、晋商等,在与王权的博弈中,成为资产雄厚的大商帮,徽州的江春、汪应庚、鲍志道,以及浙江等地商人,在扬州盐业市场占有主导地位,成为拥有百万、千万资产的大盐商。

他们占有经济与文化优势,成为一个影响皇帝及官僚的贵族群体。但当时没有诞生一个像华盛顿那样的杰出政治家,制订一部宪法,创造一个成功的政治体制,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权!

乾隆年间,人口突破3亿,粮食产量不断增长,财政收入最高达到8000万两银子,有人力、财力优势推进工业化,但皇帝坚守农耕立国的思维,以大地主身份出租土地、森林、矿产、盐业等资源,不受竞争、没有风险地获取高收益。

他掌握的财富超过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君王,当然没有动力出台公司、金融、合同、物权等法律,以适用市场公平竞争,当然不会承认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同时,皇帝不投资建大学、科研院所,他以科举把官位当做商品,批发给秀才、举人,从人身和思想获得了对学者的控制,变成绝对服从帝王,毫无独立人格的僵化群体,怎能产生牛顿、亚当·斯密、爱迪生等挑战权威、揭示真理的科学家、经济学家、发明家?

没有法治保障,又无科技资源支持,商人贵族的资本无法越过血缘关系,与社会其他人士的财力、智力结合投资工业,只能与王权结合获取经济资源,以资本支持子弟读书做官,以捐献巨资帮助朝廷承担救灾等公共服务,获取政治权力保护家族的生存权,并将银子带回家乡建宅院、修祠堂、买田地以光宗耀祖。

所以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徽州盐商、山西票号积累了千万两银子,成为当时最富有的贵族群体,发挥了优化配置经济资源、推动商品流通、带动城镇建设的作用,但没有宪法保障他们的财产权,只能靠家族经济共同体形成的信用出售农产品,维持低水平的商业,不可能跨进资本主义的大门,造就像洛克菲勒、福特那

样的跨国集团。

对比之下,欧洲贵族主要诞生于城市,以公爵、骑士、官员、商人、资本家、思想家为主,有自己的城堡、封地、商业,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享有独立于王权的选举与监督权,有参与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力,形成互相制约的格局。

皇帝主导国家资源配置失败,导致亿万人贫穷落后

欧洲工业文明给人类创造的一系列奇迹,以及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真理:国家配置资源的成败,能否建立公平分配体制,决定国家的成败。

从中国 2000 多年的王权更换,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反差:没有出现志向远大的政治家,优化配置国家资源,实现富民强国,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相反掌握国家资源的帝王将相,却在无效、失败配置资源,浪费纳税人的钱粮。

明清两代,贵族以优化配置经济资源,为社会提供了物质财富、文化资源,但这种资源极为有限、稀缺,不能满足几亿人口的生存需求,一个民族向现代化转变,需要国家输送资源。

明清两个帝国,掌握的财力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但皇帝的执政目标非常单一:保护农耕文明就保护帝国的安全,没有从“消费型”的王朝,向“公共服务型”的国家转变,反而朝着维护小农经济与王权的方向演变。

为了延续小农经济、强化王权,皇帝不投资办学校,让老百姓吸收知识,而是让他们变得愚昧无知;不让他们以科学揭示事物的真相,而是让他们走进寺庙迷信鬼神;不让他们优化配置资源走向富裕,而是让他们守着几亩薄田过穷日子;不让他们主张民主、自由,而是释放暴力、专政!

皇帝主导国家资源配置失败的恶果是:失败的政治体制引发分配不公,造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破坏,摧毁了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与文化成果,重建文明的代价极其高昂,而平民百姓无力承受。

由此,中国人年复一年在贫瘠的黄土地耕种,却难以积累物质财富,人们的生命与财产,随时面临强权的侵犯,不断重演悲剧的命运,并且给西方人留下了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印象!

于是,中华民族出现“文明能量供给不足”,即不能由家族供给教育、医疗、司法、救济等资源,转向国家提供公共服务;不能从维护王权专政,向维护公民权利的国家转变,国家像一个得不到合理营养、发育不健全、虚弱无力的人,这怎能创造伟大的文明?

对比 15 世纪以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功能、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源不再属于国王所有,国家不是为了体现王权的意志存在,公民享有平等、自由的权利,议会监督总统优化配置政治与经济资源,为公民提供教育、就业、医疗、交通、治安、救济等公共服务。

从治家到治国富民,让公民实现光荣与梦想

为完成这本书,我先后调查近 10 年,站在不同的时代背景,穿越时空,揭示贵族推动中华民族的转变,书稿的主题、结构、内容、表达的思想,发生了几次改变。本书后记有详细的介绍。

刚开始,我偏重于他们取得的物质财富与政治地位,揭示家族兴衰对中华文明的影响。

但家族掌握的财富,只表明他们占用更多物质成果,过上富裕生活,不代表中国建立了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成功体制。因而我的主题从“家族的辉煌”,转向“贵族的理想”。

宋代以前的世袭政治、军功贵族,只享受王权赋予的权力与财富,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不起任何作用,变成一个没有奉献精神、不能造就成功体制的剥削阶级。

明清两代,以家族经济共同体培养的贵族,有学识、财产、理想,靠个人奋斗获得财富与权力,以道义唤起公众告别愚昧无知,追求名利,却不独自占有财富,心怀富民强国的理想,与欧洲贵族具有共同点。

例如辛亥革命爆发前后,长江中下游的官员、学者、商人、资本家贵族,看到皇帝不能代表国民的利益配置公共资源,把家族积累的忠孝资源,转化为救国的良知,以日知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同盟会等组织,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希望创造一个走向民主的成功体制,让亿万人实现光荣与梦想!

此后,长江流域不同行业的贵族,参与创办国民党、共产党。共产党创始人

之一的陈独秀、董必武,出身于有贵族血统的书香家庭,都取得了秀才功名,最后又放弃名利,为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奋斗!

认识到贵族品质决定国家品质后,我把主题提炼为“贵族的理想”,即他们从维护家族利益出发,向社会输送经济与文化资源,以终结王权暴力政治,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国家,这是贵族的一个重大贡献!

一个正在向 14 亿人口挺进的中国,生存资源紧缺的矛盾会更突出,需要政府优化配置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建立利益共享体制,打破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公、缩小贫富不均、让更多人分享改革的果实,建立一个富强与法治的国家!

张华侨

2015 年 4 月 16 日,于南京汉中门。

2015 年 11 月 10 日,修改于黄山屯溪黎阳新村。